

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与理论变革^{*}

韩 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①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进程。历史将证明，它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影响和效应完全可以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相媲美。本文试图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变迁与理论的变革，作一次历史哲学的思考。

一、启动改革开放

哲学思想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舆论先导。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②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就是由一次思想的闪电、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讨论所启动的，这就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③ 人类是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提升自己，推动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是理论活动创造历史，而是实践活动推动发展、创造历史。真正的哲学来自人民实践活动，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解放思想的哲学。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扮演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01）研究成果。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0 页。

^② 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年，第 150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43 页。

了思想解放的理论先导。

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我们冲破思想的牢笼。要真正打破陈规旧制的束缚，在体制机制上进行结构性改革，就必须让思想冲破牢笼。在描写欧洲从中世纪走出来的变革时，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指出：“新时代的精神可以称之为改变的精神、改造的精神和变革的精神。”^① 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就是以自觉而强烈的变革精神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习惯和陋俗往往成为限制我们创造力的枷锁，只有打破思想的牢笼，才能挣脱陈规旧俗的束缚，如对来自苏联模式所谓“计划经济”的膜拜、对市场的排斥、对商品经济的恐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无论党还是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② 重要的是，中国的思想解放是着眼于历史发展和新质的生成，而不是否定性的历史行为。邓小平把改革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就要正视我们在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③ 要变革、要创新，就必须让思想冲破旧意识的牢笼，摆脱“两个凡是”的禁锢，让思想在更加广阔的空间思考，这样的思想才能规划更加宏大的发展路径，激励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变革的实践，从而拓展中华民族发展复兴的可能性空间。

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我们走出自我封闭。理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而教条主义是束缚我们思想的桎梏。要真正解放思想就必须摒弃教条主义，如计划经济的教条、“一大二公”的教条、阶级斗争的教条。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我们不仅摒弃了“两个凡是”的教条，而且通过进一步的思考扬弃了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哲学，让带着实践温度的哲学运思多样性展开。思想的解放推动了改革，改革的实践淬炼了思想。在改革中思想持续得到解放，解放了的思想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推动力量。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我们不仅可以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装备，也可以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当时邓小平曾经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吸引外资，合资经营包含资本主义成分，但我们并不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它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至于管理方法、科学技术，则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资本主义管理方面好的东西，社会主义也可以用。”^④ 一个人只有开放自我，才能构建

① 斐迪南·滕尼斯：《新时代的精神》，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65页。

一个内涵更加丰富的自我；同样，一个民族只有放开胸襟，才能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民族。哲学思想启动了改革开放进程，改革开放又推动了哲学视野的拓展。哲学思考与改革开放的实践，进入了双向塑造、相互促进的历史进程。一个民族，只能在与其它文明体的交流互鉴之中，才能激发创造性的内在活力。改革给中国发展注入了动能，而且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海量人力资源和市场推动了世界经济繁荣。不仅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国际间的交流互鉴，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同样需要在国际交流中得以实现。正像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①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充分展现了邓小平论断的预见性，正是这种预见性思想规划并引领了当代中国的跃升式发展，让中国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优先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开放进程。

二、开拓发展道路

改革的哲学启动了改革的实践，改革的实践检验着改革的哲学，促进了哲学理论的深化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背后有坚实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真理标准大讨论让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再次获得了进行彻底理论思考的勇气。我们认识到，为人民谋幸福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是有了这种关于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发展，才能指导发展着的社会实践。

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就在于我们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唯物史观在道路探索中持续地发挥着探路火炬的功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我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方面要走出让我们陷于徘徊和困境的“老路”，另一方面也不能走向与中国国情不符的“邪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除了“左”的思想影响之外，还有种思潮非常强劲，即“发达国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体系，因此，这种体系同样可以灌输到其他国家，而不考虑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特征和历史条件。”^② 但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发展都必须从特定社会的既有历史条件出发，发展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一个基于既定社会条件的历史生成过程。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条件形成了人们之间不同的权利关系，这就构成不同社会发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37 页。

^② 卡瓦基特·辛格：《不纯洁的全球化》，吴敏、刘寅龙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47 页。

展的不同历史条件或历史前提。中国以及许多国家的改革进程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明确告诉我们：“这种在不考虑基本权利关系和文化差异条件下进行的制度灌输，不仅其本身是无效的，而且事实也毫不留情地证明：这种做法是反生产力的。”^①“显然，把一种解决机制强加给另一个国家，而不考虑这个国家的特殊性，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式。”^②中国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走自己的路。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③这就是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自我成长、自我完善，我们是要成为更加丰富和强大的自我，而不是变成自我否定的“非我”或“他者”。

从苏联那里学来的模式也越来越缺乏活力，苏东剧变显然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资本主义的市场比较有活力，但又存在贫富分化的根本制度缺陷；历史也证明，凡是走新自由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不成功。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抉择。在对比中俄两国的情况时，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研室主任阿列克谢·马斯洛夫指出，中俄“两国改革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是突然采取西化方针，用西方经济模式代替苏联模式。而中国的改革方式从一开始就是反映国家特色和非常务实的：从西方借鉴一切对中国有利的东西。同时保持经济上的独立性。中国广泛对外开放市场，但做得非常谨慎……启动改革的同时，中国人并未放弃自己的遗产，而是将其发扬光大”。^④显然，我们是独立自主地开展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又引进市场经济；坚持自力更生，又广开大门引进外资。我们逐渐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条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的道路。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⑤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是为了探索符合历史规律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让社会主义重新焕发了生命力、提升了吸引力和影响力，使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感受到了模式之争的压力，这充分证明了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寻求现代化路径过程之中，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方针，那么就很容易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中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显著地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这一经验充分证明，只要选对了道路，即

① 卡瓦基特·辛格：《不纯洁的全球化》，第 147 页。

② 卡瓦基特·辛格：《不纯洁的全球化》，第 149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42 页。

④ 阿列克谢·马库林：《中国改革开放并未放弃自身遗产》，《参考消息》2018 年 7 月 19 日，第 14 版。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482 页。

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对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实现赶超。”^①

寻找促进社会发展的新动力。社会要发展，就要有强劲的发展动力。动力来自何处？按照唯物史观，就是要改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力的活力得到充分释放。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激活了中国社会，极大地释放了人们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则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在生产诸要素之中，人是最具能动性的力量，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是生产力水平跃升的关键。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尊重劳动、尊重人才，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先是通过高考和教育改革，^② 激发了全社会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情；然后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把知识分子纳入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行列；随后是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出台，鼓励人才成长、促进创新文化；创新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这也是中国竞争力提升的战略支撑点。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唯有不断创新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有人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靠的是劳动力的成本低廉，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因素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储备了人才队伍。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竞争力越来越走向了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方向。按照经济学家费尔普斯的说法，“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③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指出，中国已经跻身全球最具创新性经济体的行列，名列第 17 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指出，通过精心策划、自上而下的创新战略，中国建立了一流的知识产权制度，推动了中国创新发展。“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转型，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而创新是这种转型成功的关键。”^④ 可见，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和不断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越来越显现了其引领发展的威力。

循序渐进稳妥推进系统性改革。唯物史观和中国传统哲学都强调历史性，一方面要有历史发展，另一方面任何发展都必须以历史条件为前提，不能割断历史。因此，我们没有搞“休克疗法”那一套，而是摸着中国实际的“石头”过市场经济这条“河”。斯蒂芬·佩里说：“中国在 40 年内实现了经济现代化，而美国花了 100

① 蔡昉：《四十不惑：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分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4 页。

② 1977 年恢复高考，激发了广大年轻人学习和追赶世界知识与技术水平热情。高考的恢复不仅成为改革开放的前奏，而且恢复高考之后的大学生也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生力军。

③ 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年，“中文版序”，第 XX 页。

④ 刘曲：《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推动中国创新发展——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经济参考报》2018 年 7 月 12 日，第 3 版。

年，英国花了 200 年。中国做到了，不是靠机遇和运气，而是运用科学方法。这种科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有关：确认想要做的事，进行不同的试验，然后调整，再形成政策。……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经历过几十年实践考验的。”^①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指导下展开的：如实事求是，问题导向；如改革与稳定的统一，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如历史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如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整体和部分、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如既注重整体谋划，又善于牵牛鼻子；等等。我们的改革是渐次展开的：从农业改革到工业改革，^② 再到服务业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渐次展开、有序推进、逐步深入。先是打开大门“请进来”，而且在沿海的“特区”先对接融合“勾兑”，有了经验再渐次推广；接着是力求“与世界接轨”，即根据世界通行的规则改造自己的法律、机制和政策，达成与世界的对接，其表现主要是积极主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随后就是产业和资本“走出去”，以自主力量参与并塑造世界资本和商品大流通，其主要表现就是亚投行的建立和“一带一路”倡议。另外，中国最初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然后才逐渐扩大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我们最初的发展更加关注经济生产的发展，随后的进程越来越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综合发展过渡。这在党的工作布局的改变中可以看到清晰的轨迹，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经济、政治、文化的工作布局逐渐变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总体布局。还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问题导向引领的变革，也是以制度建设性为旨归。正像有学者指出的，“推进改革开放，既要解决具体实际问题，更要注重制度化建设和法治化建设。这是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③ 再者，中国的改革是根据社会发展而不断进行的持续变革。正是这种持续的变革，让中国的航船在经济全球化的海洋中绕过无数急流险滩，经济社会不断获得发展。中国在进行关于变革的思考与实践，只有在变革中才能有新的思想，只有在变革中才能走出新路。

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④ 这些历史性成就，就是中国人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现实基础。

① 孙微：《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谈改革开放——中国的成功靠的是运用科学方法》，《环球时报》2018 年 5 月 25 日，第 7 版。

② 改革从农村开始，所以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实践起点。

③ 魏礼群：《改革开放耕耘录》，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8 年，第 127 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第 16 页。

历史的变迁推动了理论的变革，理论的变革又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是历史前进的辩证法，也是理论创新的辩证法。

三、树立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 40 年来，经过长期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改革和深入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停步，而是继续蹄疾步稳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和历史性成就。改革的态势是“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推出一千五百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有效地破除了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改革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②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打开大门，为了发展主动向外资开放；二是学习模仿，主动与世界接轨；三是在并跑和竞争中推动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改革开放虽仅 40 年，其历史效应却是深远的。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面貌，而且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显而易见，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要求重塑中国人的现代文化认同。摆脱文化自卑，重塑民族身份，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发展的重要任务。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必须也必然能够构建稳定开放的民族自主意识。自卑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完全放弃自己，试图让自己变成令人羡慕的“他者”，“全盘西化”论者就是代表；二是极端情绪化地排外，敌视与自己不同的“他者”，文化复古主义就是体现。真正的文化自信应该秉持理性平和的态度，既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又善于发现别人的优长；既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又通过学习“他者”来丰富自身的文化，形成符合自身传统的时代思想理论体系。新时代呼唤新理论，我们当下的民族运思应该构建引领民族复兴的新哲学。

构建有实践基础有现实内容的哲学。实践在哲学中的首要地位，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界的共识。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实践才能加以理论地理解、现实地解决。社会从来不是“本来的存在”，而是通过实践而“生成的存在”。^③ 改革开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第 10 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第 3—4 页。

③ 参见韩震：《生成的存在：人类实践本体论》，《江海学刊》2002 年第 4 期。

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所塑造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趋势，是哲学讨论和思想解放所激发的伟大实践的行动结果。改革开放的行动实践和民族复兴的发展趋势，又呼唤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理论创新。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那么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反映这一主题的内容实质。

构建有交流互鉴有广泛包容性的哲学。实际上，中国人民正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才变得越来越自信，因为真正的自信就表现为开放包容。改革开放是中国自主地打开大门搞发展，特别是在“入世”之后，中国人民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运用国际市场规则，更加包容地参与市场竞争，更加开放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类人才、两种规则，市场意识、知识产权意识、法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指出：“事实上，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一直是福不是祸”。^①但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些人士依然抱持“与他者对峙”的价值观，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企图通过种种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面对当前“逆全球化”现象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泛起的态势，中国却掷地有声地宣布：“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②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获得了历史性发展，也只能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中国不是在建隔离“墙”，而是在建世界的联通“桥”。中国不再把世界看作是自己的“他者”，而是看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伙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国将以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为各国分享中国红利创造更多机会。”^③中国的国际话语不是像某些国家那样不断地制造更多的“他者”，而是积极“建群”以形成更多更大的“朋友圈”，通过交流互鉴塑造更多更广的“我们”。通过转化“他者”成为合作共赢的“我们”，不仅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追求，而且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经验。

构建有未来追求有高远理想的哲学。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民族的崛起都必须以全球为舞台。全球，而不是一地一隅，应当成为我们哲学理论建构的基点。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是“天下观”，这是当时对周边国家文化辐射的话语表达。在笔者看来，“天下”仍然是平面理解世界的概念，而“全球”才是思考世界历史的真正理论视野。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散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历史已经超越中国的天下观而进入了全球史的阶段。中华民族只有超

-
- ① 王一：《基辛格的影响力，源于何处——弗格森访谈录》，《解放日报》2018 年 5 月 13 日，第 6 版。
-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29 日，第 14 版。
-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29 日，第 14 版。

越所谓“四海之内”的“天下”视野并将其转换为“全球”视域，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实现民族振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只有积极介入全球经济贸易合作和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只有在引领世界和全球治理的探索性进程中，中华民族才能成长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

构建引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哲学。中国正走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仍然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只有深化改革，社会才有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只有扩大开放，中国才有成长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民族的空间。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在发展中调整社会关系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获得发展的持续动力；只有不断扩大开放，才能给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此同时，改革的深化需要通过开放不断扩大空间和资源，而开放的扩大也因空间的扩大和差异性的增加而激励创新，推动进一步的改革。改革开放让中国得到发展，中国的发展也造福世界。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①改革开放让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推进了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这种双重的推动将把中华民族引向伟大复兴的目标。

构建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哲学。中华民族复兴的哲学是有自觉主体的哲学。这个主体就是 21 世纪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人民。民族复兴的哲学是与民族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的。新时代的哲学是中国人民的哲学、中华民族的哲学、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新的哲学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只有当中国哲学成为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她才配得上引领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荀子》曰：“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之”。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世界格局，但是中国并不试图颠覆国际秩序，而是参与维护国际秩序。中国的历史传统决定了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这种维护是积极的，即让国际秩序朝着更加民主、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方向进行完善和调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哲学是有时空定位的哲学。中国的哲学必须立足本来，但必须在借鉴外来的同时面向未来，做到与时代共节奏、与世界同步。只有这样，才能有高远的价值观作为哲学运思展开的广阔视野。作为时代精华的哲学都是基于特定时代和境遇的，因而是特殊的；但真正的思想精华都是面向未来理想的，都应该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因而又是普遍的。如果哲学是在思想中把握的世界，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第 21 页。

也是在现实中能够引领世界的思想，那么新的中国哲学就应该是反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哲学，是反映中国人民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的哲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达。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哲学是有强大社会功能的哲学。新的哲学是有深厚学理支撑的，更是能够引领实践的理论，可以准确地把握时代、能动地反映现实、创造性地塑造未来。人的主观意识必须通过客观活动才能得以展现，但是没有主观意识的活动不是具有实践力量的活动。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只有真正从理论的高度、思想的深度上转变观念，才能在对象化的实践行动上加以展开。我们必须以深化改革寻求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以扩大开放扩展发展的空间和舞台。改革开放开启于一次哲学大讨论，而改革开放的深化必然始终伴随着哲学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哲学视野的持续拓展。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 中华民族的复兴呼唤引领时代价值的理论思维，也呼唤新的哲学。中国共产党无愧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先锋代表”。^② 21 世纪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的哲学。这种哲学是有自身形态的，又是开放流动的；新的哲学就是启动了改革而又继续推动自身和社会变革的哲学。这种哲学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实现的现代性启蒙，让中国人民超越了古代中国的哲学视野；这种哲学因具有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滋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实践的淬炼，也应该超越西方所谓“现代性”哲学的视域。我们不仅要有高质量的“中国制造”，也要有高品质的“中国创造”，还要有独具特色的当代“中国理论”和“中国哲学”。早在 160 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预见复兴的中国将带来“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③ 一百多年之后，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用一种总体性的理论，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图景，这一图景体现了深邃的中国智慧，彰显了哲学理论的时代价值。

〔责任编辑：王 广〕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37 页。

② 陈瑶、李家瑞：《墨西哥学者海因茨·迪特里希：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先锋代表》，《光明日报》2018 年 5 月 6 日，第 8 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28 页。